

诚信历史篇

第一篇



# 第一章

## 诚信伦理的道德观念的萌发、发展

### 一、先秦时期的诚信伦理道德

#### 1. 诚信观念的萌发及确立

“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立身处世之本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自古以来，先哲们就对“诚”、“信”的含义作了诸多阐述。

##### (1) “诚”、“信”，互训

“诚”真心真意，如开诚布公。《后汉书·马援传》：“开心见诚，无所隐伏。”

“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系统的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言。”《易·系辞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忠信所以进德也，信于民也。”《国语·周语上》记载：“礼之所以观忠信、仁、义……信所以守也。”《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把诚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

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这就是说，自己想要的东西，让别人先取，谓之善；自己有善心，相信别人也有善心，这就叫做信。人自身具有美德才能称之为信；经过先秦诸位思想家的论述，诚信成为儒家着重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

根据“信”之本义，应分为诚实之“信”和不欺不疑之“信”。关于诚实之“信”先秦时期历史文献多有阐释。如：

《左传·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征”，证明、

证验之意。

《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意为人说话要算数。

《管子·枢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说，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

孔子也多次讲过诚信，如：“信则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孟子是这样论说诚信：“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

墨子也极讲诚信：“志不强则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老子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超脱的庄子也极重诚信：“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诚之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这就把诚信道德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韩非子说得更干脆：“巧诈不如拙诚。”

总之，古代的圣贤哲人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并把此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政治之道、交友之道、处世之道。人而信，则至诚无妄；见之于伦，朋友信也。诚信是使人與人相安共处、互爱互助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基础。从古至今，凡是诚实守信者，最终都受到世人的敬重和爱戴，而一切言行不一者，必定遭到人们的鄙夷和唾弃。

诚与信可以互训，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信”必须建立在“诚”的基本之上。通俗地讲，诚信就是守诺、践约无欺；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人生活 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则。

“信”的另一种含义是不疑、不欺。体现在治国之道上，就是国君对于贤才给予充分的信任，关于这一点，古人很早就有所认识。

《国语·齐语》中记载了鲍叔荐管仲的故事：“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席臣也。君加惠于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是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管夷者五：宽惠济民，弗若也；治国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如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幼也。君若寡而反之，夫犹是也’……比至，三衅、三浴之。桓公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

鲍叔荐管仲，其中恪守忠贤为重要条件之一，可见早在先秦时期，社会对“诚信”的看重。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子指出，治国之患有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忠臣不信是不用贤才，信臣不忠是用小人，君臣异心是不信贤的结果。晏子又说：“国之不祥有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贤而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若人君既聋又昏又疑，国之不祥，莫过于此。由此可见晏子对以信用人的重视。

《吕氏春秋》比晏子更进了一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以信用人的道理。吕氏认为，用人不疑、不欺，信任有加所以重要。是因为立功要有一个过程，用人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急功近利，那是不可能。孔子始用于鲁时，鲁人私下议论纷纷，怀疑他的能力。但用之3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子产始治之郑，实行改革，百姓不能理解，但3年之后郑国大治，百姓转而说：“我有田畴，而

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使嗣之？”如果鲁哀公、郑简公不是信任不疑，而是听到非议就放弃孔子、子产，“侧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下能也，虽罪施，于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在吕氏看来，用人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所用之人才。

汉高祖刘邦在其政治生涯中也认识到得天下与信人不疑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汉书·高帝纪》记载：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禽（通擒）也。”群臣悦服。

这是汉高祖在洛阳南宫设宴与臣下的一段对话。臣子高起、王陵指出项羽失天下的重要原因是怀疑贤德之人，而刘邦则进一步论说了信任、重用人中豪杰张良、萧何、韩信是他得天下的关键。将“信”置入政治实践之中从而得天下的事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屡见不鲜。

唐朝著名宰相魏徵更重视以信用人。他引管仲的话说：“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贞观政要·诚信》记云：“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信之为道十分重要；“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魏徵认为，如果国君对贤才不加信任，

则“懦弱之人，怀忠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大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接受了魏徵的诚信思想而成为一代英主，记载贞观年间“方针政策”的《贞观政要》专辟“诚信”篇，可见诚信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以信用人，不欺不疑，不仅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进行过阐述，一些贤明的君主、明智的政治家还把诚信道德实施于治国之道，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诚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主要指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实事求是。人若有信，就是一个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说到做到、言而有信、鄙弃虚伪、堂堂正正的人。“诚信”凝结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经过几千年文明历史的锤炼，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 （2）大道之行，讲信修睦——“诚信”道德观之发轫

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之间的某种道德关系的表现。原始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其伦理道德也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第一个历史类型。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从已发现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推算，至少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原始群、血缘家族、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等级，没有君主和国家，各氏族部落“共推”、“共举”自己的首领管理自己的事务。“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里所说的“知母不知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形。随着父系制的出现，对偶家庭也就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于

是就有了“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那么，原始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什么呢？他们懂得什么是“诚信”吗？十分遗憾，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对于远古人类的诚信道德观念只能进行推测。

《尸子》记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狩猎是原始社会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而形成一项集体活动。人们最初只能猎取较小的动物，后来才获得较大的对象。特别是飞索石、弓箭的发明，使狩猎有了重大的发展。半坡出土的骨、石箭头数以百计，其中骨箭头有三角形、圆柱形和柳叶形多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石、骨箭头也很多，多为柳叶形。这说明，远在母系社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活动。假设氏族首领约定某日某时进行狩猎，氏族成年男子必须参加，如果大家守约而行，狩猎活动就能正常进行，氏族内部的生产活动就能正常运作；假如大家都不守约，这次狩猎就会放弃。在远古时代，没有复杂的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在集体生活的圈子里，人们逐渐懂得，要生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必须守约。

根据现代学者对尚存的原始部落的考查，参阅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出原始人类已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关于我国上古原始人的道德风貌，《礼记·礼运》记载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上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反映出原始社会的公有观念、平等观念、互助观念，而其中所说的“讲信修睦”，就是讲诚信，修和平之意。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童年，在那远古时代，“没有军队、宪兵

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他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担的义务。”这就是原始社会共产主义——一个有条有理的社会秩序。尽管原始人类也有战争，有血亲复仇，但凭着“讲信修睦”，人类终于走出了洞穴，走出野蛮；走向进步，走向文明。

原始社会的“信”道德观念是模糊的、抽象的、朦胧的。原始人类没有文字，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学说，但他们那种在经验之中产生的道德观念萌芽，仍然对以后的历史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 (3) 诚信”伦理道德观念之确立

经过血与火的历史锤炼，人类步入了阶级社会。夏部落首领禹，打破“禅让”制，组建军队，建立了世袭的夏王朝，标志着国家的正式诞生。关于夏代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代表其社会部分面貌。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时代。由于有地下大量甲骨文及其他文物的出土和古书的记载，使人们对商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其特征是氏族血缘关系的存在；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的结合；伦理思想和宗教意识搅在一起等。由于当时人的思维能力低下，系统的伦理学说还没有形成，正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所云：“我们翻遍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卜辞中的意识形态：第一，着重时间观念；第二，着重空间观念；第三，着重数量观念，时、空、数三种观念所以普及，是人类对自然斗争和部落间的战争所促成的。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

此处“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观念。由于“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所以，

卜辞中“祸、咎、不利、不吉”等字，是全体族员对自然与外族的宗教意识，还不是一般权利义务思想的表现。在卜辞中，固然已经出现了“孝”、“德”、“礼”等字，但这些字的内涵并没有多少伦理道德的含义。据考证，卜辞中的“孝”与“老”、“教”相通；“礼”则是指盛有双玉的祭器。因而，这些字还不能作为道德规范来使用。

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新的政权，时间是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前 771 年，这时，原先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的“孝”、“德”、“礼”等字，开始具备了独立的道德意义。如周王以“文”、“武”、“康”等字命名，即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蕴。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兴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以德受命”、“以德配天”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在周公姬旦的许多谈话、命令里都贯穿着伦理思想。他认为“德”是由天所命的，商朝灭亡是因为“惟天不界，不明厥德”，而周代兴起也是因为“上帝”和“皇天”赋予其“德”。周公总结了一套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并认为这也是上天赐予民众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西周的伦理思想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

大约从晚商至春秋，“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开始出现在金文上。金文是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青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如中山玉鼎上就铸有“余知其忠（信）也”的文字。以后，青铜器上铸“信”字的还有战国中山王方壶铸“忠信”二字等。

随着“诚信”道德观念的逐渐系统化，我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资料上也出现了关于这方面记载：

如：《易传·系辞上》曰：“言出乎身。”意思就是说言语是从人的身体发出，人说话要兑现，要身体力行。在金文中，中山鼎王上的“信”字，也是由言和身组成。言与身组合成“信”，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信”的思想内涵。

《易传·系辞上》还说：“人之所助者，信也。”

《易传·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易·中孚》：“信及豚鱼也。”

《易·革》：“信志也。”

《易·大有》：“信以发志也。”

《易·系辞传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

《易·系辞传下》：“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意即诚挚待人，严守信义。

而“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反映的是上古时期，人们守信约而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情况。

《易传》是《易经》的一部分。《易经》原名《易》、《周易》是儒家经典六经之一。《易经》是巫史们积累大量筮辞经过筛选、整理、编排而形成的一部占卜用书。经文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以预卜吉凶。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爻辞合起来就是《易经》的经文，解释“经”的部分就是《易传》。

《易传》的价值在于它对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论述，富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一部很有哲理的著作，而它对于“信”的述说，标志着“诚信”伦理道德在先秦以前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经之一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部分基本上是民歌，多为西周末和春秋前期的作品。《诗经》中除了农事诗、庙堂祭祖颂歌以外，也有关于吟诵“信”的诗句，如：

《卫风》：“信誓旦旦。”

《郑风》：“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庸风》：“大无信也 不知命也。”

《王风》：“谓予不信 有如日。”

《小雅》：“慎尔言也 谓尔不信，”

《大雅》：“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笈”；王道尚信 则天下以为法。”

《召驹》：“驹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意思是说至信可以感神。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也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云：“信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即是。

有了文字，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就开始由经验型逐渐走向理论型。那些铸在青铜器上的“信”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信”；宣告着我们的先民们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那些用熊熊烈火锻造出来的“信”那些从先民们的心智中宣泄出来的“信”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前列！

## 2. 先秦诸子谈诚信

公元前 770 年至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前期是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割据。其时流血战争连绵不断，中华大地一片厮杀声，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尔后历史进入了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国争雄的时代，这也是我国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封建制的确立带来了两个飞跃：一是封建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个是思想文化的飞跃进步。

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而私学的兴起，则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封建制刚刚确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格局，因而不同的阶级、阶层都要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他们要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种种不同的看法，要对改革时弊设计出种种方案，这就必然出现观点各异的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相互间进行激烈的争辩，于是出

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关于战国时代的学派，汉代司马谈的《六家要旨》将其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上刘歆的《七略》分诸子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这些学派由于产生的地域、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及探讨问题的侧重面不同，出现了“百家异说”、“处士横议”等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但令人们惊异的是，在伦理道德问题上，具体地说，在“诚信”这一道德观念上，各派学者基本趋向一致，从而出现了“驳难下的趋同”这一文化现象。

春秋时代处于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的状态。据不完全统计春秋各国军事行动有数百次。各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当战争各方处于势均力敌，就协定盟约。而盟约的签订、实施，靠的就是“诚信”道德力量的约束。大凡胜利者，除智勇以外，必须讲守信约。有了“诚信”，就赢得了道德力量，就赢得了天下民心。大量的“诚信”社会实践，需要思想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阐发，这就产生了各学派对“诚信”伦理道德的论说。

### (1) 儒家之诚信“仁”学框架下的道德观

儒家是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由于孔子年轻时曾从事过“儒”这种职业，所以后人把孔子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最重要的是“孟子之儒”和“孙（荀）氏之儒”两派。因为在先秦，儒家是诸子中较大的学派。在伦理观上，儒家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原则，重义轻利，提出了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智、勇等道德品质，以及“忠恕”、“中庸”、“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伦理原则。而对于“信”，从祖师爷孔子开始，都十分重视，从理论上论说，从实践上力行，从而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论“信”：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政治伦理学家。孔子的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就是爱人，以“亲亲”和“爱众”为主要内容，同时要求有一系列道德观念作为仁学的组成部分。诚信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的诚信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仁”为核心内容，以“信”为表现形式。

孔子把“仁”作为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方式和对士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如《论语·子路》云：“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次矣。’”

这是孔子对士的基本要求，而“言必信，行必果”则是最次一等的士所应该做到的。孔子的这段话分别说到士的三个层次：头等的为国效力，次一等的为宗族家乡作表率，第三等的注重个体个人的行为。此处孔子论述的角度、对象不同，并无鄙薄“言必信，行必果”之意。以后，“言必信，行必果”成为后人立身处世的千古名言。

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信”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规范，多次进行论说：“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同时还把“信”置入儒家道德修养中进行论证，其做法是：一是把“信”列为四教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表示要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即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忠心耿耿、坚守信约；二是把“信”当做实践“仁”的重要途径之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能做到“恭、宽、信、敏、

惠”就是“仁”。孔子的学生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言可复也”意思就是说话算话。

第二，以“诚信”作为人的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在车辕前面有一个用以套牲口的横木，横木两头有一个连接车辕的活销。大车的活销叫，小车的活销叫车子没有它们，就套不住牲口，车就无法行走。孔子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人而无信，就无法做人，就不能立身处世。所以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处世做人的道理，孔子把“言忠信”放在第一位。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主张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人有诚实的信德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讲求信用，办事才会通达。因此，孔子把“朋友怀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把“谨而信”作为对弟子的基本要求，并在道德教育方面设立“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的内容来教育学生。

孔子还把“信”推置到社会的各方面，认为于君、于民都必须讲信。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儒家子弟提倡对民、对君，只要自己讲信用、取得信任，就能够去指使或批评对方。否则，就会被民认为是虐待，被君认为是诽谤。

第三，以“信”作为从事政治、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原则。

孔子认为，即使治理一个仅一千辆兵车的小国，也要对百姓诚实不欺，否则国家就治理不好。前文所述子贡问孔子治理好国家要具备哪些条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这三条，以“信”最为主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生活在春秋乱世，诸侯征战，民不聊生社会背景之下的孔子，清楚地看出百姓是否相信政府，是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因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在民心。因此，他劝导当政者对百姓要讲信用。“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慎”。统治者讲信用，老百姓也就能以诚相待。

#### 第四，讲信立信，身体力行。

《孔子家语·在厄》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工作巫货，窃犯围而出，告余于野人，得为一石焉。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之，不悦，以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问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尚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问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乃服之。

这是孔子的不欺不疑之信，正是因为其在仁学的框架下从多侧面论说信伦理道德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为其后奠定了基础。

#### 孟子谈诚信：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业于孔子的孙子之思，是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同孔子一样，重视伦理道德，但更强调内心的道德修养，他主张“修身”、“养性”、“反身内求”等修养方法，认为通过修养，可以发挥人的本性，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样就可以“反身而诚”，达到“至诚”的道德境界。

关于“诚”，《孟子·离娄下》曰：“居于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守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界和人立身处事的共同的最高道德法则，努力追求“诚”是人必须遵循的法则，由此可见诚在孟

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孟子推崇“至诚”，其伦理思想是政治型的。他强调道德修养是政治的根本，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诚信伦理定位在朋友关系之中。“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论古人。”孟子认为交朋友最重要的是做到诚信、谦虚，要“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种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的品质，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孟子还说：“善人也，信人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在谈到人与禽兽的区别时，他把“朋友有信”作为其中的一个条件，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作为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把“信”置于“仁义”的大框架下进行论说，在充分论证“至诚”的哲学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信”的道德意义。

在道德教育方式上，孟子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真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只有努力追求最高的理想人格，才能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形成道德情感与道德信念的共鸣。孟子关于诚信道德的论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荀子谈诚信：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教育家。其学问涉及面很广，哲学、政治、伦理、经济以至文学，都是他所注意和研究对象。他的著作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格局即将结束，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形成的交替之际。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对以前或同时代的各个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综合的批判；同时，他也受到这些学派不同程度的影响，吸取并发展了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尽管荀学具有批判综合各家的特色，但从思想渊源来说，主要来自儒家学派与管子